

中共渠县地方党史资料丛书

渠县红军回忆录



中共渠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

中共渠县地方党史资料丛书

渠县红军回忆录

邹以菊

中共渠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

编审小组

苏仕钧	沈佐臣	郭福安	杨杰
余九万	寇森林	杨多贵	范明朗
欧汉英	郑云方		

责任编辑

欧汉英

校 对

朱清远

封面题字

魏传统

封面设计

赵建中

序

1932年12月，英雄的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，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军川北地区，创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。1933年9月红军进入渠县，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。渠县人民在“扩大红军”的战斗口号感召下，很快形成了一个父送子，妻送夫，兄弟相送当红军的热潮，数以千计的青少年踊跃参加了红军队伍。从此，他们经受了长期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，创造了悲壮的英雄业绩，为党为人民建树了卓著功勋。

老红军有血有肉的战斗回忆，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。文章朴实无华，读之，扣人心弦，催人泪下，激人奋起。它是对干部、职工，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、革命传统教育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极好的乡土教材。

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之际，出版了这本回忆录，目的在于我们通过研读，学习工农红军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坚定信念；学习工农红军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、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；学习工农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、艰苦朴素、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。以此激励全县人民团结奋斗，锐意改革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长征中，再创英雄业绩，再添历史丰碑的光彩。

让我们沿着红军开辟的道路，奋力拼搏，勇猛前进！

中共渠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目 录

- 我的少年时代……………赵佛山（1）
- 草鞋情……………陈子望（23）
- 开辟第二条运输线……………陈子望（29）
- 陈再道师长指挥我们打第一仗……………贾曙光（41）
- 红军改编 开赴抗日前线……………贾曙光（43）
- 山城堡一战结束十年内战……………贾曙光（46）
- 广阳战斗……………贾曙光（48）
- 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活动……………贾曙光（50）
- 夜袭阳明堡机场
——怀念赵崇德同志……………贾曙光（52）
- 神头岭战斗的回忆……………贾曙光（54）
- 响堂铺战斗与粉碎日寇的九路围攻……………贾曙光（56）
- 罗瑞卿同志事迹片断……………贾曙光（58）
- 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中的邯郸战斗……………贾曙光（60）
- 回忆上党战役……………贾曙光（63）
- 追……………晏绪伦（66）
- 我所知道的红四军内的“肃反运动”……………晏绪伦（73）
- 怀念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李建忠同志
——写在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前夕……………晏绪伦（78）
- 长征途中红四军的一个尖兵连……………晏绪伦（85）
- 王维舟、耿飚两同志在陇东领导的反顽斗
争片断……………晏绪伦（93）

- 回忆徐向前同志在红四军迎送会上的讲话……晏绪伦(98)
- 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爱护
 警卫战士……晏绪伦(100)
- 反“封锁”的伟大战斗……晏绪伦(106)
- 王震旅长在南泥湾……晏绪伦(117)
- 李先念同志指挥我们过日军封锁线……晏绪伦(122)
- 怀念廖光绍同志……晏绪伦(127)
- 湘西剿匪和改造土匪记实……晏绪伦(130)
- 在黑山阻击的日子里……晏绪伦(139)
- 在受挫折的道路上……贾本维(146)
- 一个心眼跟党走……贾本维、李怀忠、黄明浦(149)
- 跟红军走才有出路……李华安(156)
- 难忘的红军时代……袁 璜(165)
- 参加红军前后……江义礼(175)
- 从川陕苏区的建立到渠县的解放……贾兴仁(180)
- 一切服从革命需要……李三多(184)
- 忆爬雪山过草地……贾春林(195)
- 我的片断回忆……杨友才(200)
- 偷渡渭水……罗汉章(205)
- 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津浦线上的
 青沧及平汉线的连续战役……罗汉章(207)
- “群众不落后，而是你们落后”……罗汉章(209)
- 针锋相对，保卫边区……罗汉章(211)
- 练兵场上……罗汉章(214)
- 回忆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……罗汉章(217)

忆当年 话战斗……………李 杰(220)

难忘的旅程

——护送朱德同志返延安筹备党的

“七大”……………李长林(227)

我的少年时代

赵佛山

1920年6月(旧历五月初五),我生于四川省渠县贵福区黄泥乡,我们一家人住着两间常年失修的瓦房和一间旧茅草房,田地也不多,不能维持全家吃穿。

我的父亲忠厚,勤劳,个性强,他除了以务农为主,还会厨子手艺,周围团转谁家有了红白喜事,都要请他去掌勺。每到过春节,许多人家都要请他去杀过年猪。我记得父亲常常不在家,经常被人请走。只要他一出门,我们就盼他快回来。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往往要给我们带点吃的东西,这都是主人赠送的,叫作送“杂包”。

同我父亲一样,我的母亲也是一个文盲。但她老人家勤劳、善良,心灵手巧。记得我小的时候,她一边织竹席,一边教我唱童谣。母亲除了为全家烧水煮饭,缝补浆洗外,农忙时下地作农活,农闲时和早晚挤时间就织竹席,织成上、中、下三等席子,赶场就去街上卖了赚几个钱来称盐打油,应付家中的日用开销。我的几个哥哥,都是从十五六岁就开始给本村地主赵普山家“帮丘二”(当长工),我三兄直到他放下地主家的锄头、扁担当红军为止。他们几个二十来岁回家后,除务农和给别人做短工外,也常跟父亲出去帮人做饭,所以现在我们家的人都能做出些四川菜,这与父兄们的传教是分不开的。

听老人们说：我从刚出生就非常不幸，是死里求生的一
个人，因为我的前头，父母已生养了四个哥哥，家中吃穿极为
困难。母亲从怀上我以后，就等于是在受罪，没有吃过一口好
饭，没有歇过一天半天，这样生我的时候就难产，生下后我
已是窒息过去了。父亲用一大把稻草把我包裹起来，放在门
后面，准备拿出去埋了，不知怎样，开关门把我挤了一下，
意外地发出两声微弱的哭声。这时我母亲一下从昏迷中惊醒
过来，她对我父亲说：“莫把他埋了，还有口气哟！”就这
样，我活了下来，并靠着吃邻居隔房嫂子的奶过了满月。

我从记事起，就开始做活路了。先是放牛割草，拾粪拣
柴，后来大些，就干些担水做饭，耕田务劳的事，农闲时
也帮母亲织席子（因织席不慎，我的右手小指头割了一个
大口子，现在还留有一个伤疤）。那时，父母常常叫我（父
母和哥哥们抽不出时间）担点菜秧或青菜萝卜去赶场卖。偶
尔，我用卖的钱除了称油盐外，也买三几个油果子带回去，
和我的弟妹们一起吃。

因为家中人口多，日子难熬。记得在我九、十岁时，我
家又在四五里外的赵家堡佃了庙会的两间茅草房和一点田
地，父亲就叫我和弟弟在那里看守家。每次干完活天刚黑
时，大人们回到黄泥嘴的家中去住宿，我和弟弟都很小，一
怕贼娃子，二怕鬼（房子前后左右几乎全是坟堆）。开始
时，当父兄们前面走，我和弟在后面跟着，哭着追，他们常
常是哄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有时把他们气极了，也打我们。等
他们走远了，我们就跑到房子后面的山坡上，大声哭叫：

“贼娃子，你们快来偷东西啊，我屋里大人都走了！”我们
这样哭叫，主要还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子。其实，贼娃子也明

知我家没有什么可偷的，也不可能来我家打主意。这样过了一段，始终也没有一个鬼来抓我们，没有一个贼娃子来偷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也经受了磨炼。从那以后，我慢慢地也不相信什么鬼神了。

我六七岁时，看见有的细娃儿背着书包去上学，我羡慕得不得了，也向父母要求去大庙河小学堂读书，父母亲也有这个念头，把我送去读点书，识几个字，写点什么东西就不求人。但是父母亲没有办法为我筹集到学费，他们除了唉声叹气，也只能留给我一个希望：“下一年再说吧！”等了几个“下一年”我始终没有能够背上书包，走进学堂的大门。

1931年和1932年之间，中国工农红军由川陕地区逐步向我们县发展。我们这一带的军阀头子杨森以“加强治安”为名，扩大县壮丁队。记得是1931年秋天的一天，乡、保长带着几个反动民团兵背着套筒大枪到我们村抓兵。当时我大兄去陕西担棉花做买卖去了，二兄听到风声就逃外躲起来了，三兄在地主赵贵扬家“帮丘二”（当长工），他们不敢抓，四兄体弱多病没有抓，这时保、甲长带着民团兵把我盯住了。我从赵家堡下午收活路往黄泥嘴家里走，他们在河的西边，我在河的东边。那时，我也根本不在意会抓我去当壮丁，因为我只有十一岁。哪想到他们盯了我一段路后，就跑过河来把我紧紧地抓住，往贵福区街上送。当时我哭喊着，坐在地上不起来，这些反动家伙们有的用枪托打我，有的用枪托拄我和拉扯起来走。我父母知道把我抓走了，也哭喊着赶来了。我被他们押在前面哭喊着走，父母在后面哭喊着一边走一边给乡、保、甲长反动家伙们说好话，但怎样

也不行，最后还是把我押到贵福区街上，关进一间小房子里。一连几天，父母在街上请客送礼，托人说情。结果人也请了，钱也花了，好话说尽了，但终究还是把我带到了县壮丁队。在那里过了两个来月，父母在家想尽了一切办法，卖东西，东借西借，凑了一点白洋（多少不知道）送给乡、保、甲长，最后才把我放回了家。

我十三岁时，即1933年秋天的样子，中国工农红军到达我们贵福区一带。当时凡穷苦人家的子弟，大些的就地参加了红军正规部队。我当时一再要求参加正规部队，他们讲，你的年龄还小，你们这一带马上要成立乡、村苏维埃政府，会有你的工作做的，比如说，给红军带路捕捉地富老财和坏人，打土豪分田地，站岗放哨，巩固苏维埃政权，保卫胜利果实。经说服解释后，象我们这样十二三岁的人都留下了。过了不几天，我们大庙河成立了村苏维埃，并宣布组织农会、妇女会。把我们村里十二三岁的十几名男少年统统叫到大庙院里开会，排列成两行，先由宣传员们讲话（他们都不过十五六岁），讲了共产党、红军的政策，我们穷人们要组织起来过好日子等等的话，接着就宣布我们这十多个人，就是大庙河村苏维埃童子团了，指定我当童子团长，并布置我们回去找大刀、矛子。第二次集合时，我们这十多个人有的拿红缨枪，有的拿大刀（找不到大刀、长矛的由乡苏维埃发了一些），每个大刀把上和长矛尖上都捆一小股红线绳或红布条，排成队伍之后，真是威武极了。我们集体住在大庙里，吃的是从地主家分来的大米，晚上睡在稻草堆里，行动是集体的。当时我们可神气了，凡是盘查不相识的行人，他们都老老实实在地给我们鞠躬，有问必答。至于本地那些地

富老财，不法分子和反动家伙们就更不在话下了，规规矩矩地听从我们的话。记得一天拂晓时，由我带领十名童子团员，给红军和区、乡苏维埃的人带路抓捕恶霸地主。由于我很熟悉他们两个家伙的住房，我们进屋后，他们还在睡觉。一见我们，吓的全身发抖，平日的威风全丢尽了。

在这时期里，穷苦人民才真正感到翻了身，作了主人，真是扬眉吐气。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斗争，我想起我大兄在1932年底和1933年初去陕西省担棉花回来后的摆谈。他回来在路上碰到了红军，听了红军的宣传。那时红军未到我们地区，当地国民党政府和坏蛋们把红军说得简直吓人极了，什么共产共妻，杀人放火，挖人心，吃人肝，长着红头发、大獠牙等等。大兄那次回家后，在晚上偷偷地给家中人讲他所见到红军的实情，说红军一个个对我们这些穷苦人和气极了，为穷苦人办好事，专打击和消灭一切反动派等等。所以我和三兄在红军来我们地区之前就有了当红军的心愿。

我在村苏维埃当童子团长两个来月时间，乡苏维埃就确定由我选择几名个子比较大点的，伶俐些的带去乡苏维埃，到了乡苏维埃就把我们编在少先队里，指定我当少先队副队长，任务是：看守犯人（地富及其他坏人），捕捉可疑的行人，更主要的是把守肖水岩要道口，坚守口子，打击从岩峰方向来的民团，及一切反动武装力量。我在乡苏维埃少先队工作时，可能是1933年10月之后，被选为参加县苏维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（我代表黄泥乡苏维埃少先队）。我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后，对共产党、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策的政策和任务，较明确一些了，懂得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起来闹革命，消灭一切反动派，穷苦人才能翻身得解

放；坐在家里，是等不来翻身解放的，是过不到好日子的。

参加完县苏维埃会议回到家，我只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就回乡苏维埃少先队了。我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天早晨一别亲人，从此后过了整整二十一年，我才重新跨进家门。当然，我是更不可能想到，我同三兄这一走，会给家里留下多么大的灾难，直到今天，我也忘不了——1953年年底我回到阔别二十一年的家乡的情景。我年迈的父母亲紧握着我和我爱人的手，流着热泪给我们讲述：我和三哥参加红军走后，我的家被当地的恶霸地主，反动的区、乡政权整得家破人散。我父亲被抓去，又吊又打。折磨得死去活来。这些家伙提出放出父亲的唯一条件，就是要我父亲把当“共匪”的两个儿子叫回来。特别是那些曾被我们带着红军抓捕过的地富老财们，对我父亲更是残忍到了极点。我的几个弟弟，也全都吓得逃往外地。我母亲为了救出父亲，只好四处借钱，买些东西，把那些恶鬼们叫到家里又吃又喝又抽（大烟）好几天。他们走时每人还得给些大洋，后来，坏蛋们也看见我们家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，才把我父亲放回来。我父亲回家后眼见家破人散的惨景，双眼被气瞎了。

1933年冬，杨森的主力部队从县城等地向我们这一带进攻，我们区乡苏维埃政府也紧跟着红军主力往后撤退。边行军边整编，这样把我们贵福区各乡苏维埃人员（赤卫队、少先队及乡区苏维埃的工作人员）统统编成红四方面军九军一个师的特务营。营长是区长担任，教导员是主力红军派来的。我被编到特务营的一连连部当通讯员。我们营的任务，是配合主力部队边打仗、边行军，白天晚上很紧张地往

西北方向撤退。可能是撤到达县西北地区时，上面决定从我们营里抽选二十名个子大点的，伶俐的去川陕少共省委训练班学习，我是抽选的二十人之一。我们二十人走了好几天，路过思各嘴时，被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周光坦同志发现了，把我们二十人统统留在总医院当看护。这是在1933年（旧历的十二月了），当时很冷，手脚都冻得发抖。不久总医院搬到王坪镇，是个区苏维埃所在地。这时每天除去各村庄给伤员换药外，下午也上一些简单的外伤救护和护理知识。1934年二三月份，我们被抽调去洪口镇的第一分医院工作。当时抢救换药任务很重，白天晚上，几乎都是给伤员换药。药物很简单，食盐水是当时消毒的主要代用品，黄胺粉碘酒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贵重药，只有重伤员才能用点，纱布、棉花球、绷带、三角巾等东西都是用了又洗，洗后消毒再用，一直用得无法再用为止。那时伤员吃的是瓜菜加点米。南瓜、青菜和萝卜就不错了，肉和油一类的东西很少见。由于条件太差，伤员们往往由轻伤转为重伤员，重伤就变成难以治疗，有的甚至因此牺牲了生命，在他们牺牲之前，没有一个讲怪话的，没有一个表示不满的。

艰苦的环境是锻炼和考验人的。我在分医院被吸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。那时不但党的组织不公开，就连团的组织也是不公开的，谁也不知谁是党员和团员。介绍人给我谈话，非常神秘，都在晚上把我叫到墙根边，有时叫到村边庄稼地里。谈话内容不许给别人讲，如果泄露出去了，那就不够入团资格。入团条件又严格又多，如：工作积极，能吃苦耐劳，不怕脏，不怕臭，不怕伤员伤口有蛆，不许讲怪话，能团结互助，穷苦人成份、农民出身等等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求不抽烟

(叶子烟)不喝酒,不吃辣子。当时的环境严酷,需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,但是也确实有许多过份的规定,如:敌机在头上盘旋侦察时,一是不许向空中看,二是不许喊叫敌人飞机来了,否则就当现行反革命分子论罪。在吃的方面,饭菜再不好,不许说不好,如果你在吃饭时不慎把碗掉地上摔破了或者撒了几粒饭在地上,就会说你不满和有意破坏。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,这许多过分的使人恐怖的规定都是张国焘为了个人的统治,推行愚民政策和高压政策,大搞军阀主义,反对党对红军的领导,妄图用枪指挥党的结果,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以家长制代替民主集中制,以惩办主义代替思想政治工作,以恐吓手段维持军纪,以打骂代替教育,以“肃反”为名杀害反对他错误路线的革命同志,干下了不少的坏事。

1934年底和1935年初,张国焘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,以迎接中央红军为名,带领四方面军由川陕苏区根据地出发,向四川省的西南方向撤退。这一带比通、南、巴地区更为山大沟深,人烟稀少。老百姓也穷苦,在山坡上挖点地种点包谷,小米、高粱等杂粮来维持生活。我们除自带一些干粮外,也就地购买一些杂粮作补给。不久就进入到少数民族地区(藏族为主),这是1935年夏秋之间,我们分院第一次爬雪山过草地。那时大雪封山,四周围都是白晃晃的,把眼睛刺激得红肿象鸡蛋大痛得要命。那时,我们不仅自己要爬过雪山,还得把所有伤员都得护送过去。有扶着爬的,有两个人搀着爬的,重伤员我们就每四个人(也有比我大点的和比我小点的)抬着一个伤员爬山。由于我们年龄小,力气不足加之高山缺氧,每走几步就得休息一下,出

出气。越到后来，越是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地向上爬。当时，环境是那样坏，行军中稍微不慎，一脚踩虚了，就会掉下山去，但我们个个是咬紧牙关，战胜了当时的恶劣环境，硬是没有让一个伤员留下。医院到达马塘村以后，一边对伤员进行治疗，同时对这一段行军情况进行总结。总结中，不少男女同志受到了军人大会表扬，我是受表扬之一，并提升我当了看护排长。那时在马塘粮食问题是个大问题，有钱、有粮的藏族上层人物，早已逃进大山或外地去了，其他不明真象的不少藏民也逃走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在本地解决不了吃的问题，医院就经常组织二三十人去马塘周围村庄买粮。有一次医院派出二十多个人去马塘西南山沟里的一个村庄买粮，刚到不久，就被反动武装把我们二十多个同志包围了。经过一场激战，终因寡不敌众，我们的同志被全部杀害在河滩上。医院闻讯后立即从马塘（离马塘二十来里路），组织了一百多人，由院长、政治教导员领导我们，带着武器赶去营救时，已经晚了。到跟前看到那个惨景实在使我们难以忍受，牺牲的同志们有的衣服被扒得光光的，有的全身都刺的是口子，有的女同志被糟踏得更使人看不下去。我们怀着深仇大恨，流着悲伤的眼泪，把这些烈士们就地安埋了。自己排里去了五名同志（三男二女）同样牺牲在那里。当时排里同志们难受得一连几天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恨不得把这些杀害我们同志的坏蛋们抓来，统统用火烧死和一刀一刀的割死，心里才解恨！

我们医院在马塘住了三个月时间，又由马塘过草地、翻雪山撤回原来方向。当时大家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共同悄悄地议论着为什么撤回原来方向又往西南走。以后才知道这是张

国焘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行径。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历经千辛万苦，付出了重大代价，才和一方面军会合后胜利翻过雪山，通过草地，到达了班佑，巴西、阿坝地区。但张国焘到阿坝后，却按兵不动，拒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，并妄图消灭党中央和一方面军，来达到他反对革命的目的。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境。所以我们第二次过雪山草地后，经过大小金川和黑水炉霍，向丹巴、懋功方向行军。大致是1935年10月，我们医院到达懋功县城。刚刚住下，还没有安排就绪，就接受川康、天全一线的伤员治疗任务。

我由于领导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，从马塘转移到懋功，沿途任务完成得好，我们全排没有发生什么问题。1935年12月，我被光荣地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并提升我当了一个所的看护长。当然这时一方面感到光荣，另一方面感到任务加重了。那时人手少，伤员多，我们每天早起晚睡，自己也十分注意对全所看护同志们的管理教育，以杜绝治疗事故。那时虽是那么紧张，那么劳累，生活那么艰苦，驻地条件是那么差，但男男女女没有一个说怪话的，大家都是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，把治疗任务完成好。我们这些男女看护同志们人虽小，但有革命的志气，有不怕苦、不怕死的坚定的革命精神。我深深地记得一件事，当时前方从敌人仓库里缴获到一批衣服，给我们所的看护发了一件上衣。这件上衣给谁呢？谁穿的衣服都是补了一个个大大小小、东歪西扯的补巴。当时很叫我作难，据所里领导口气是给我穿的，自己作为看护长，又是一个党员，绝对不能自己穿，可是发给谁都不要。这件上衣一直放在我床头半个多